

· 经济观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 现实约束与实现路径

余泳泽^{1, 2}, 陈建³

(1.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现代财税治理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3.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 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来看, 供给侧要素支持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 需求侧有效需求释放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源泉, 制度侧环境优化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在经济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加快的背景下, 供给侧要素流动壁垒、需求侧有效需求不足、制度侧体制机制障碍是抑制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约束。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应利用要素市场化配置打破要素流动壁垒, 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激发有效需求,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关键词: 民营经济;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要素市场化配置; 有效需求

中图分类号: F12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5)05-0003-12

一、问题的提出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也依赖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1]。根据中国政府网数据, 截至2024年9月底, 中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 086.48万户, 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 十余年间增长超4倍。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2025年2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强调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既‘放得活’又

收稿日期: 2025-02-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失信的空间传染效应与创新知识溢出: 量化识别、机制分析与传染路径”(4247119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23JZB005)

作者简介: 余泳泽(1982-), 男, 河北承德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E-mail: yongze125@126.com

陈建(1998-), 男, 江西赣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E-mail: chenjian_ncu@163.com

‘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持力量。根据求是网数据，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 085.7万户增长到2025年1月底的5 670.7万户；2012—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1.1%，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占比稳步提升，体量逐渐增大，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丰富内涵来看，民营经济有助于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双循环流动。一方面，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民营经济运行机制灵活、市场反应快的优势有助于实现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2]。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是经济内循环的微观基础，鼓励民营经济做精做强、创新发展也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举措^[3]。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助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民营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力量^[4]。

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家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5]。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目标使其具有鲜明的内生创新属性。另一方面，在创业过程中，民营企业具有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和探索进取的竞争意识，以及对市场前景的分析判断能力，助力技术、管理、产品、模式等方面的突破性创新^[6]。当前，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根据中国政府网数据，2019年以来，新设民营企业在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四新经济、数字经济等核心产业的占比分别达90.2%、93.3%、93.4%、94.6%，民营经济在助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7]。从增量来看，一是民营经济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增加民间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动力，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常年维持在50%左右。二是民营经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供税收来源和促进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民营经济为人熟知的“56789”特征凸显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分量。三是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合作，制定全球化发展战略，是外贸第一大主体，持续发挥外贸“稳定器”的作用。从质量来看，民营经济促进了市场竞争，激发了市场活力，激励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质量，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民营经济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快速响应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结构，通过数字化转型、改进管理方式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稳链、固链、补链、强链等方面有效协同，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8]。

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国内经济在转型阶段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技术架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上述因素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民营经济固有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进一步限制了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分析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厘清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约束，探寻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实现路径。

二、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

民营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十分丰富。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9]。同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在经济运行中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 高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0]。民营经济的发展应注重供给侧、需求侧、制度侧的管理, 现有文献也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究了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

(一) 供给侧要素支持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

资本、技术、劳动力和数据等要素资源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元素。郭玉晶和宋林^[11]利用LMDI模型和重力模型测算资本、劳动力、技术要素对民营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发现, 1992—2014年, 民营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和技术驱动, 资本和技术呈现动态交替形式, 劳动力对民营经济增长的驱动强度在2009年之后有较大提高。只有保证全面充足的要素供给, 才能有力支持民营企业成长壮大, 进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要素是要素配置的重要引领者, 在现代市场经济乃至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2]。资本供给对接资本需求、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渗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13]。金融集聚^[14]、互联网资本^[15]等带来的资本投入增加都会促进民营企业的成长。技术创新是企业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也是助力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16]。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动力变革是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7]。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容易受到资源不足的约束, 提高外部资源可得性是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举措^[18]。劳动力是组织中最具活力的要素, 其数量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其质量决定了企业的创新情况和效率。劳动力质量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正向影响^[19]。此外, 高层次人才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升企业决策质量、治理能力和业绩水平具有积极影响。数据要素已成为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核心生产资源,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数据通过与现有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现实生产要素^[20], 进而提高现实生产要素效率。利用好数据要素能有效提高民营企业资源利用效率^[21], 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 助力民营企业实现生产和经营模式的创新, 拓展民营企业生产函数边界。

(二) 需求侧有效需求释放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源泉

根据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理论,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自主创新和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22]。围绕顾客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支撑点, 由需求引致创新与创造是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3]。由于民营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主动和有效利用原有工业体系提供的需求, 所以能够在创业初期就迅速和全面地进入各个工业领域, 尤其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 从而创造出显著的增长绩效^[24]。早期民营企业发端于为国有企业配套生产, “四千”精神很大程度上描述的就是民营企业开发市场和对接市场需求的过程。

足够的市场需求才能支撑广阔的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发展拓展了空间, 促进了两者的互利合作, 并且市场规模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25]。就国际需求而言, 民营企业对国际需求冲击的反应强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26]。就国内需求而言, 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需求牵引下的竞争力提升效应同样强于国有企业。新时代以来,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意味着市场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发生改变, 这决定了民营企业需要适时转型升级, 以满足消费者高质量的产品需求和高水平的服务需求。

（三）制度侧环境优化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

制度是构成企业动态环境的重要变量，在影响经济主体预期与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制度在准入、注册、生产、退出各个环节引导、约束或激励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预期，对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等具有深刻影响^[27]。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变迁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法治、行政干预、产权、税收等方面的制度环境都会对民营经济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产生一定影响^[28-29]。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其中，产权制度安排是关键。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保证^[30]，也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前提^[31]。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也会对企业精神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创业行为^[32]。消除制度性障碍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竞争中性、开放准入秩序有助于民营经济发展^[33]。以制度侧环境优化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是关键，这既要求政府在缺位领域积极作为，也要求政府在越位领域约束自身行为^[34]。

三、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约束

虽然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等政策，但民营经济仍存在阶段性震荡与趋势性收缩、横向竞争加剧与纵向升级受阻、创新质量下降与转型动能不足等突出问题^[35]，面临市场盈利能力下滑、企业循环不畅、结构升级困难等挑战^[36]。现阶段，供给侧、需求侧、制度侧的现实约束对民营经济内生动力产生了抑制作用，使其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需要明晰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约束。具体来看，在供给侧，受要素获取制约，民营企业难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需求侧，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较大的市场环境压力；在制度侧，受限于体制机制障碍，民营企业无法充分发挥增长潜力。

（一）供给侧要素流动壁垒抑制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融资环境持续收紧，民营企业增长动能减弱

“融资的高山”一直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卢圣华和汪晖^[37]基于大语言模型分析“地方领导留言板”中有关民营企业发展问题的留言发现，关于经营要素获取和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问题的留言最多，约占民营企业诉讼总数的35.32%和33.42%。当前，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占比与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比和生产总值产出占比均不匹配，民营企业的资金获取障碍突出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一方面，由于存在主观上的地位认知，以及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38]，所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大量的信贷资源向风险相对更低的国有企业倾斜，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的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在资本市场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即使民营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但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资金被挤占，中观层面的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微观层面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更高的交易成本及风险补偿^[39]，这些都使民营企业面临更高的利率要求，需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

2. 创新资源获取困难，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有限的创新资源限制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第一，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难以支撑持续高额的研发经费。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竞争激烈的产业链下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整体盈利水平较低。根据界面智库、Wind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每

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98元,为历史同期新低;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中有26.1%的企业存在亏损。第二,民营企业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存在被歧视的情况。部分项目在申报条件和评审标准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歧视性规定,相关单位没有立足于项目需要,而是根据所有制评高低,根据规模判优劣。第三,民营企业缺少参与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机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更倾向于与国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民营企业缺少接触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重点实验室的机会,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话语权不足,较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3.人才错配问题突出,民营企业发展潜力受限

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培育了数量庞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人才错配问题。第一,民营企业对高水平人才吸引力不足。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的影响,高水平人才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流动,民营企业在稳定性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竞争力较弱,民营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供给总量呈现相对过剩趋势^[40]。根据猎聘发布的《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48.04%的毕业生的意向单位是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20.55%的毕业生的意向单位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仅有14.55%的毕业生的意向单位是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第二,民营企业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当前,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方面亟须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的复合型人才,但高校毕业生整体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难以适应企业发展需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超过2,形成民营企业“用工荒”和毕业学生“就业难”供需错配的结构性问题。

4.数据要素应用低效,民营企业智能转型受阻

数据要素是新型生产要素,宏观上在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微观上在赋能企业绩效提高、效率改善和决策优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民营企业存在数据要素获取与应用效率较低、数字经济赋能效果一般等问题。第一,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数据要素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民营企业自身技术、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支撑不足,导致转型认知差异和转型路径模糊,其面临“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问题。第二,民营企业数据产权难以确认。数据确权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国家数据局虽然在数据产权、企业数据开发利用等方面推出相关文件,但数据产权登记和流转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存在“留白”,各地各部门的确权方案存在标准不统一、互通互认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第三,整体上数据要素市场流通不畅。一方面,基于数据安全考虑,民营企业获取公共开放数据的门槛和条件较高,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获取具有高商业价值的公共数据。另一方面,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造成数据互联互通不畅,不利于数据要素边际收益最大化。

(二) 需求侧有效需求不足抑制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民营企业经营风险上升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累积。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动荡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巨大风险,中美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等经济冲击严重限制了全球贸易复苏的空间,部分西方国家则以“中国产能过剩论”破坏合作和限制贸易。此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预测,特朗普掀起的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可能进一步限制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企业发展,随着外部市场需求波动增大,企业出口量下降,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上升^[41]。近年来,美国对华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中国企业出口额和出口概率显著下降,也对小微企业产生更严重的抑制效应^[42]。在国际贸易风险上升、需求低迷的情况下,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需求冲击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43-44]。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仍将持续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外需疲软、外贸乏力使作为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的民营企业压力巨大。

2.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民营企业经营活力减弱

在国内环境方面,中国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转换,经济复苏的总体形势向好,但也面临物价低迷、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偏高、就业压力较大等问题。近年来,CPI指数和PPI指数连续低迷,内需乏力、成本高企等问题导致生产端和供给端面临较大压力,抑制了民营企业投资,不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54%,较上年下降0.26个百分点,而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66.0天,较上年增加4.2天。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账款回收期限延长等因素对民营企业收入和盈利形成较大压力,进一步抑制了民营企业经营活力。

在有限的有效需求下,民营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第一,在纵向竞争方面,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民营企业广泛分布在下游产业^[45],上游产业能够凭借垄断定价加成提升盈利水平,下游产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难以提高定价,这样的结构分布挤压了下游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第二,在横向竞争方面,民营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聚集在相对集中的行业,同质化产品充斥市场。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通过薄利多销、改进产品质量和提升服务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因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有限,其发展必然受限。此外,竞争非中性和同质化竞争使得大多数民营企业处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低端环节,形成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46]。

(三) 制度侧体制机制障碍抑制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权益保护制度缺位,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受挫

权益保护制度缺位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一,个别部门不执行政府定价,在交通物流、水电暖气等基础服务和金融领域存在违规收费情况,甚至利用行政影响力和解释权对企业采取加价收费、强制服务和捆绑收费等措施,背离了为民营企业纾困减负的初衷。第二,个别地方政府存在趋利性执法和违规异地执法行为。在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个别地方政府为缓解创收压力以罚增收,这既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塑造。第三,知识产权保障难以落实,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被盗用、模仿,“傍名人”“搭便车”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挫伤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2.竞争中性原则偏离,市场主体结构失衡

竞争中性原则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拥有同样的竞争地位和竞争机会,不受企业性质、企业与政府关系、企业与周围环境关系等因素的影响^[47]。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与竞争中性原则相悖的问题。无论是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竞争中性原则缺失,还是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有偏执行都限制了产业政策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也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48]。尤其是市场准入壁垒的存在违背了竞争中性原则。2018年底,中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让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但由于存在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对民营企业的偏见,所以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和审批许可等方面可能遇到“隐性规则”。例如,部分项目指定国有企业参与;部分领域采取定点生产经营制度,民营企业无法进入;个别准入条件设置不合理等。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的竞争非中性让民营企业面临较多监管,不利于产业内的有效竞争和民营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3.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民营企业投资波动较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提升民营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关键。中国始终强调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举措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但目前仍然存在政务服务效能不高、制度保障有待完善、惠企政策稳定性和精准性不足等问题。第一,在政务服务方面,政务数字化建设极大地便利了涉企服务,但也存在基层部门数字化建设不充分、不均

衡问题。相关服务集成化和系统化程度不高，涉企应用过多、网上办事流程不清晰、部门间协调性差等问题依旧存在。第二，在制度保障方面，解决涉企账款拖欠问题的制度保障有待完善，中小民营企业应收账款确权难、诉讼成本高等问题影响资金回笼，不利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长期投资。第三，在惠企政策方面，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政策未能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发展需求，民营企业对政策预期存在误解，导致政策实行效果差、政策优惠感知度低。此外，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仍可能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密集度高但协调性低等不利于民营企业形成良好预期的问题，使民营企业难以稳定生产。

四、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实现路径

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深刻的技术变革，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保证民营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进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一）利用要素市场化配置打破要素流动壁垒

充足的资金供给和稳定的要素资源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支持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壮大的基础。构建资源高效配置的要素市场，确保民营企业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既要让民营企业及时便利地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和要素资源，也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民营企业要素使用成本，提升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

1. 加强融资支持，发挥政府有限资金撬动效应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第一，金融机构应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和支持。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金融工具降低借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全方位评估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市场前景、信用信息和信贷需求，为民营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如支持贷款、融资租赁、票据贴现等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满足民营企业个性化的融资需求；构建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引入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等第三方平台。例如，宁波市融资担保机构推出“政银担”业务，与市级财政和金融机构按比例分担代偿损失，分散风险敞口，提升金融机构的借贷能力和意愿。第二，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完善金融资源配置，发挥有限资金的撬动效应。一方面，突出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增加国有创投机构对初创期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投入，发挥政府性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将部分政府基金转化为市场化基金，通过与产业龙头和头部基金机构合作，提高民营资本参与比例，形成“产业+资本”双轮驱动。例如，杭州市以政府基金为杠杆，撬动市场化资本，发挥“国有资本搭台、民营资本唱戏”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提升民营资本活力。针对研发投入高、周期长的企业创新活动，既要提高民营企业创投风险容忍度，也要用好财政资金，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创业试错。例如，通过构建风险补偿资金池为民营企业创业投资提供风险补贴，利用“人才创业险”“科技成果转化险”为民营企业免除后顾之忧。

2. 保障创新资源，打造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

保障民营企业创新资源的可得性是提升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第一，提供低门槛创新资源，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一方面，降低科创园区的进入门槛，为更多民营企业提供“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的低成本产业创新空间。另一方面，构建以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孵化器和公共服务平台为主体的创新生态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第二，构建市场主体协同创新平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创新联合体。一方面，以产业链为基础，构建包括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在内的创新平台，利用平台整合优化科技资源，建立资源

共享机制,破除民营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壁垒。另一方面,以科技领军企业引领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民营企业抱团发展,进而化解创新风险,突破规模限制,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第三,推动重大创新项目组织方式变革,构建新型产学研科技合作机制。支持具有研发实力的民营企业“挑大梁”,牵头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以企业出题、学校解题的产学研科技合作新范式替代委托研究或科研项目等合作模式,促进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转化和新产品的研发测试。

3. 加快人才培育,完善民营企业引才保障机制

加快人才培育,支持优秀人才流向民营企业。这既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也能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第一,以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才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引导民营企业与高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提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开展订单式培养计划,根据市场需求丰富课程内容,填补企业复合型人才缺口。同时,支持民营企业与职业院校对口合作,通过建设实训基地等吸引专业技能人才,深化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提高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第二,以完善的保障体系和激励机制支持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这既要求民营企业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提高劳动者工作待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要求政府降低民营企业人才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成本,构建轻松的生活环境和激发高效的工作状态,促进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此外,吸引高端人才和技能人才,应创新人才流转机制,支持科研人员保留教职参与企业技术研发,推动高等院校与企业人才“互聘共享”,破除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壁垒。

4. 强化数据治理,形成数字经济赋能路径

数据治理应以有序、规范、安全为核心,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目标。第一,有序推进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向中小民营企业开放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增加普惠性数字化工具供给。一方面,建设更多通用型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平台,培育“小快轻准”的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降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另一方面,提供“训力券”“服务业数字赋能券”等数字化转型支持工具,支持企业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第二,支持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是数字经济赋能民营经济的基础,完善的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权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监管体系是有效保障数据供给和数据流通的前提。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构建产权明确的制度安排、统一规范的交易平台、活跃高效的流通体系、开放包容的数字治理生态,解决数字壁垒和“数据孤岛”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民营经济组织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方面的潜力。第三,在安全合理范围内向民营经济开放共享公共数据。这能够增强数据要素的共享性和普惠性,强化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打造安全高效、互联互通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例如,成都市搭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数据公园,打造“公共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向民营企业安全开放,实现数据价值创造的最大化目标。

(二) 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激发有效需求

面对国际需求下降、产业回流和关税压力的客观环境,以及国内需求不振、成本高企和竞争激烈的现实问题,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立足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有效路径。民营企业应练好“内功”,主动参与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身风险抵御能力。政府应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提振市场需求,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

1. 塑造核心竞争力,灵活化解国际循环风险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韧性、技术韧性打通国际循环。第一,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民营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应瞄准前沿科技领域,加大

研发投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促进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摆脱产业链低端锁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第二，加强产业链协同，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在相互关联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鼓励企业以产业集群方式“抱团出海”，提升中国品牌的影响力。深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提高产品定价和资源配置的联动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降低国际贸易风险和生产经营成本。第三，灵活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以技术韧性打开全球市场。民营企业可设置地区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以“去中心化”布局规避技术和数据跨境流动风险。

2. 强化政策支持，筑牢国内大循环发展根基

当前，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孕育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也蕴藏着客观的发展空间，释放内需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第一，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激发消费潜力。一方面，借助“两新”政策刺激传统消费需求。2024年部署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明显，未来可以进一步健全相关工作推进体系，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带动行业投资和效益增长。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创造新型消费需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够更广泛地激发市场创造力和活力，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第二，拓宽发展空间，增加民营资本投资需求。一方面，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领域，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尽快落实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和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的开放布局和参与机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民营资本参与投资的新方式，保障民营资本回报，提高国有企业开放程度，激发民营资本入股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在确保要素精准有效供应和充分挖掘有效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放得活”与“管得住”有机结合，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1. 加强权益保护，提供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保障民营经济权益才能有效激发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第一，加快制定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经济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既要完善民营经济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细化产权保护法律条文，保障民营经济产权，也要在执法过程中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规范涉企案件执法程序，加强执法监督，畅通企业申诉渠道，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第二，确保市场监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坚持放管结合，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地位。一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合规指导，为企业经营设置好“红绿灯”“防火墙”，对涉及新业态、新业态、新模式的民营企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适当采取柔性执法，助力新兴市场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及时公布涉企收费清单目录，避免越权收费和超标准收费，规范涉及民营企业的行政检查和执法监管。第三，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处力度，解决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举证难、维权成本高和诉讼周期长等难题，加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激发民营企业创新积极性。

2. 落实竞争中性，促进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竞争中性原则、引导民营经济有序参与竞争的关键。第一，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开放领域公平公正对待民营企业。这要求全面清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违规准入许可和附加条件，尤其是明显针对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资质、股东成分等不合理条件。同时，在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方面，简化手续，缩短时间，降低成本，激发民营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市场重组的效率。第二，废除阻碍公平竞争的隐性规则

和潜在歧视。既要防止在招投标资质方面设定排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条件,建立规范统一、公开透明的流程,也要遏制特定行业通过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限制民营企业参与,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坚持竞争中性原则,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3.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民营经济制度供给质量

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民营企业预期,增强民营企业信心,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第一,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切实做好行政服务工作,强化数字政务建设,优化审批流程。例如,衢州市出台歇业备案“一件事”实施方案,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减轻民营企业负担。第二,健全沟通机制,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建立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听取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意见。例如,陕西省通过“陕企通”服务平台,对企业问题受理、转办和反馈等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在政企互动过程中坚决防止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良性关系。第三,促进政策协同,提高政策精准性和落地性。各涉企部门应协同联动,推动企业账款拖欠等重大共性问题 and 融资等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在助企纾困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发挥协同效应,既提高政策的精准性,也提高政策的落地性,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 田国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是关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4):22-32.
- [2] 冒佩华,杨浩宇.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J].上海经济研究,2023(6):29-40.
- [3]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0(7):42-49+157-158.
- [4] 周文,司婧雯.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J].财经问题研究,2022(10):3-12.
- [5]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3.
- [6] 周文,李雪艳.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45(2):1-10.
- [7] 赵文军,葛纯宝.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6):9-19.
- [8] 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课题组.以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J].财贸经济,2024,45(9):19-30.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99.
- [10] 耿成轩,鄂海涛.民营经济制度演进中的政府行为优化与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3(5):65-68.
- [11] 郭玉晶,宋林.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轨迹——基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4):15-27.
- [12] 胡怀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J].经济学动态,2022(9):18-31.
- [13] 刘戒骄.增强要素流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纵横,2019(4):45-51+2.
- [14] 张玄,冉光和,蓝震森.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成长——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门槛模型的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17(1):128-138.
- [15] 王文涛,曹丹丹.互联网资本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创新驱动路径视角[J].统计研究,2020,37(3):72-84.
- [16] 孟猛猛,陶秋燕,雷家骝.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1(3):27-37.
- [17] 郭敬生.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遵循、机遇和路径[J].经济问题,2019(3):8-16.
- [18] 冯根福,郑明波,温军,等.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九大中文经济权威期刊和A

-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再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1): 17-35.
- [19] 刘一鸣, 王艺明. 劳动力质量与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21, 44(1): 3-24.
- [20] 谢康, 夏正豪, 肖静华. 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 产品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42-60.
- [21] 胡贝贝, 王胜光, 段玉厂. 互联网引发的新技术—经济范式解析[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4): 582-589.
- [22] 厉以宁. 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J].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8(2): 1-8.
- [23] 王生斌, 王庆翔, 胡岩.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顾客路径、需求路径与自发路径——基于“顾客至上”视角的理论分析[J]. 宏观质量研究, 2024, 12(6): 44-61.
- [24] 郭年顺. 工业体系和民营企业兴起? ——基于 252 家中国最大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J]. 南方经济, 2019(12): 15-32.
- [25] 洪阳, 兰传春, 洪功翔.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市场规模效应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 42(2): 101-112.
- [26] 钟腾龙. 外部需求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0(1): 147-156.
- [27] 黄速建.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学逻辑与核心命题[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122-139.
- [28] 马忠新. 营商环境与民营经济发展——基于营商文化“基因”的历史考察与实证[J]. 南方经济, 2021(2): 106-122.
- [29] 余泳泽, 陈建. 税收激励与民营经济创业——来自“营改增”的证据[J]. 经济评论, 2025(1): 3-19.
- [30] 闫爱青.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视角[J]. 经济问题, 2022(10): 36-42.
- [31] 唐松, 温德尔, 叶芷薇. 恒产者恒心: “原罪”嫌疑、产权保护与民营企业绩效[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3): 995-1016.
- [32] 程俊杰.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J]. 经济管理, 2016, 38(8): 39-54.
- [33] 卢现祥. 从三个制度维度探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J]. 学术界, 2019(8): 52-65.
- [34] 张慧一, 张友祥. 制度变迁、政府作用与民营经济发展——基于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118-124.
- [35] 任晓猛, 钱滔, 潘士远, 等. 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思路与举措[J]. 管理世界, 2022, 38(8): 40-54.
- [36] 刘伟.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J]. 治理研究, 2024, 40(5): 4-10+157.
- [37] 卢圣华, 汪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营企业诉求: 基于“地方领导留言板”和大语言模型的实证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4(9): 84-97.
- [38] 何德旭, 曾敏, 张硕楠.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 ——基于债务融资视角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2, 38(11): 189-207.
- [39] 彭向, 邹慧. 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与民营企业创新[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111-123.
- [40] 崔宇. 基于供给侧视域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新路径构建[J]. 经济问题, 2020(6): 80-87.
- [41] 李捷瑜, 巩加美. 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出口网络与企业出口行为[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11): 4-18.
- [42] 张瑜, 高翔, 张俊荣, 等.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J]. 中国管理科学, 2024, 32(7): 45-53.
- [43] 张国峰, 陆毅, 蒋灵多. 关税冲击与中国进口行为[J]. 金融研究, 2021(10): 40-58.
- [44] 邓晓飞, 任颀.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0(12): 28-33.
- [45] 潘珊, 黄莉.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J]. 财经研究, 2021, 47(12): 122-135.
- [46] 王欣. 新时代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制度演进、现实刻画和未来进路[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4): 5-25.
- [47] 陈宗胜, 马锦山. 竞争中性机制与我国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4): 75-86.
- [48] 余泳泽. 通过产业政策优化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J]. 应用经济学评论, 2024, 4(1): 65-72.

The Driving Mechanisms,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Realization Paths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YU Yongze^{1, 2}, CHEN Jian³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Institute of Modern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Gover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00,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Summary: The private econom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a strong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serves a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a complex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rofou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du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ase.

Firstly,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fostering its development from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econdly, from the aspects of supply, demand, and institutions,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s that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t reveals that factor supply support is the basis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release of market demand constitutes the sourc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s the guarantee. Thirdly, the paper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hindering the stimulation of the private economy'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se include supply-side barriers such as the continuous tightening of the financing environment,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innovative factors, the prominent mismatch of talents, the in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data factor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demand in the demand-side market lik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insufficient domestic market demand. Additionally,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such as specifically systemic gaps i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deviations from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systemic deficienci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ve suppresse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Finally, addressing these realistic constraints, this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through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ensur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optimiz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mproving data governance to break down barriers to factor mobility. Furthermore, it advocates shap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via an unimpeded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to stimulate effective market demand, and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s to reinforce rights protection, imple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by break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Key words: private econom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arket allocation of factors; effective demand

（责任编辑：孙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5.05.001

[引用格式]余泳泽,陈建. 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驱动机制、现实约束与实现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5(5): 3-14.